

从长沙走马楼吴简看早期楷书的形成与发展

白悦炜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 两汉三国时期是汉字书体演变的关键时期,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探索早期楷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本文以吴简为核心,结合钟繇章程书的吸收与楚系简牍的对比,分析早期楷书的特征及其楷化轨迹,揭示书体演变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吴简; 早期楷书; 钟繇; 楚系文字; 书体演变

一、长沙三国走马楼吴简

关于走马楼吴简的发掘: 20 世纪 80 年代,长沙市五一广场发现了大量战国至唐宋期间的遗址,1996 年 10 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五一广场东南侧的走马楼建设区域发现了一批三国时期的简牍,这批简牍被称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编号为 J22。走马楼简牍多达十余万枚,简牍种类有简、牍、签牌、封检、封泥匣等,内容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1]

吴简的年代是指吴简简文中的纪年所反映的起讫时间。就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主要有“中平”、“建安”、“黄武”“黄龙”“嘉禾”等年号,主要年代大致是从中平二年(公元 185 年)始至嘉禾六年(公元 237 年)迄。在这较大的时间跨度内,长沙郡的统治主要经历了孙坚统治时期(187 年至 190 年、刘表统治时期(190 年至 208 年)、刘备统治时期(208 年至 215 年)和孙权统治时期(215 年至 237 年)。

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它的出现对中国三国时期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字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有不可小觑的贡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田余庆教授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说:“长沙吴简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西北屯戍简牍、敦煌藏经洞、清宫内阁档案相提并论,也将形成某一门学科的分支,成为国际学术界相关的研究课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先生说:“长沙三国吴简的出土,对于相对贫乏的三国史料做出了意想不到的、全面而精确的补充,由于三国时期政治分裂、政权频繁更迭,这一时期的文字遗迹少之又少,使得对于书法史的研究难上加难,白谦慎先生也曾说“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者来说,三国时期的书法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领域,我们对于这一时期书法史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极少。”^[2]直到长沙走

马楼三国吴简大量出土,经过清洁整理,《文物》刊登了《长沙走马楼 J22 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券》上下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捌)公布了 10 万余枚竹简的图版及释文,这对于我们研究三国时期吴国书法无疑是提供了重要的直接史料,所以长沙走马楼吴简对三国时期的书迹研究特别是吴国的书迹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考古发现可认为是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发现。”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说:“三国吴简的发现将会有力地推动三国时期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赋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预示着沉寂相当一段时期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3]

二、早期楷书的定义与特征

早期楷书起源于东汉末年,代表人物钟繇被誉为楷书之祖。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鍾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4]其中铭石书是庄重的隶书,行狎书随意恣肆的快写行书草书“章程书”处于两者之间也就是早期楷书。黎泉先生在《简牍书法》中说:“简牍书体中有些字因急于速成,或者出于书写者的兴趣,波折不甚明显,棱角突出,这种书体比隶书易写,又比章草规整,看来,这就是早期的楷书。”由此可见,早期楷书的产生主要是出于便捷出写的需要,俗字现象是早期楷书应运而生的原动力,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笔势,可以理解为文字构件的变化(草化、位移)所致,二是笔画逐渐呈现八法形态。

其特征之一是“自然性”。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邳下之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 鍾,工夫过之。”^[5]此段书论所提及的“功夫”和“天然”虽然在字面意思的理解上相悖,但以此来理解早期楷书的特征却也恰当,钟繇作为提

及早期楷书的代表人物，书法功力自然不用多说，可此处所提及的“天然”并非缺乏尺度和规矩的原始状态，而是在足够“功力”前提下凸显出的褪去人为返璞归真的自然形态。

特征之二是“势态表现”。“点如高峰坠石”：一个点像高峰上摇摇欲坠的石头即将掉落的势，即点画中轻重缓急体现的节奏感、流动感和空间中的不平衡感体现的张力和倾向。早期楷书字形结构的不规整和多变就是势的表现。它的不齐、错落、变化和唐代楷书平正端庄都是不同的审美，没有好坏之分，也只是早期和成熟之分，后者是不断追求平正端庄审美所呈现的形态并成为后来社会的主流审美，但往往有自觉意识的书家都在朝反方向探索——不齐和变化也就呼应了刚才所提的自然。

楷书的前身“新隶体”追求速度的书写，出现了“永字八法”的点画形态，在后期向楷书的衍变中更加体现笔势，楷书的成熟要比草书和行书晚一些，早期楷书往往夹杂着隶法或点画的草写，证明早期楷书有“先草后工”的过程，例如钟繇的《荐季直表》和《谷朗碑》就可以见得。

三、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楷化现象

合体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条件之一，当一种或一种以上书体发展成熟至某一阶段，由书家将其提炼、吸收再结合自身审美与判断融合化一所展现出新的艺术形象，它揭示了书体发展的客观规律。“隶为篆之捷，楷为隶之捷”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多是赴急文书和平常用途，不同于庄重典雅的庙堂隶书或青铜铭文，不难看到虽是同一时期的竹简木牍，但其书体并行杂糅并无统一的法则和规范，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书体发展趋势，所以像长沙走马楼吴简这样的民间书法是早期楷书形成与发展的旁证，而钟繇等名家书法就是书体演变的中流砥柱，承上启下的联系。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金石盘盂都是有为而作的，真正的古代文化，应该是靠竹帛来记载的。”同理，真正的古代书法面目应该是由简牍帛书中的手写墨迹来展现的，三国时期是书体嬗变的关键之一，所以三国吴简为我们研究早期楷书的形成有重大意义。

在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中，钟繇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从东汉到魏这一历史转折期。时至今日，钟繇的真书最被推重，所谓“真”即“章程”的约音，也被称为“正书”。刘正成先生在其文章《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图文结合阐明钟繇章程书对后世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中能够窥探出早期楷书的形成与发展的苗头。宋少华认为“长沙吴简的字体，

有隶书、楷书、章草、行书、草书等，虽然这些普通刀笔吏、墨客之手的墨迹较之钟、王大师的艺法尚有天壤之别，然而却是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准”^[6]

在走马楼吴简和钟繇楷书的对比中能够清晰看出二者在结体和用笔上有雷同之处，及其相似。笔画逐渐呈现八法形态。

根据简牍出土的分布情况可以将其分为南方简牍、中原简牍和西北简牍三大板块，其中南方简牍以战国楚简、里耶秦简、长沙五一广场简以及本文所论述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为代表。从楚文化起始的战国楚简到三国两晋简牍的出土在数量和研究价值上并不完全相等，有数量多字迹清晰保存完好的，也有数量少且难以辨析的，但从这星星点点的线索中可以看到楚地文字系统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过程中，战国文字是重要的一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战国简牍大多是出土与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即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域，其简牍也就是楚国文字。从春秋中叶开始，随着楚国势力不断壮大，楚国与东周在各方面的冲突与隔阂日益增大，故其文字也与周的风格逐渐分离，呈现其独有的姿态。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快速发展，文字也受其影响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楚国文字是当时南方文字体系的中心，书写流畅华丽，北方则以齐国为中心，书写端正整齐。

于1953年7月发现的湖南仰天湖楚简是国内第一次出土战国时期的简牍，如图1，其书体为楚系古文，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结体宽大而扁纵，字势倾斜，线条圆转秀丽，提按分明。



图1

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的包山楚简如图2，内容丰富，纪年明确，大多为篆字结体，隶意书之，

秀丽雄强,极具动态。笔力粗浑圆劲,用笔恣肆率意,侧锋,藏头露尾,从中可以探出由篆变隶的苗头。



图 2

长沙东牌楼木简如图 3 是东汉简,书体特征丰富,字体杂糅,包含了隶、楷、行、草等书体特点。个别笔画如捺画都在向楷书发展,由此可见从汉简至三国吴简的文字在发生微妙变化,由隶向楷形态初现。



图 1

前面所提到的三个简牍在时间线上来说都是早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大概说明了在三国之前楚系一脉文字的楷化情况,接下来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为中心,在时间上选择其后的简牍来说明早期楷书的楷化情况。

郴州苏仙桥西晋简于 2004 年 2 月被发现。参考其时期与西晋人陆机《平复帖》如图 4 书写时期相近,它大部分书迹呈现

楷体形态,也有部分存留较多隶意。



图 2

四、结论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研究早期楷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揭示了书体演变的多重动力与复杂过程。

早期楷书的形成不仅是书写效率驱动的结果,更是实用需求与艺术自觉的双向作用:吴简中大量公文简牍的“赴急”书写体现了隶书向楷书简化的必然性,而钟繇等书家通过“章程书”对笔法的提炼则彰显了艺术自觉对书体规范化的推动。

楚系文字从战国简牍到三国吴简的演变轨迹,展现了南方书写传统对楷书发展的独特贡献,其流畅性与提按变化为楷书的“势态”特征奠定了基础,并与北方“端正整齐”的书写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吴简书迹的“不稳定性”(如横画波挑与捺画提按共存)表明,早期楷书是长期渐进演变的产物,其核心特征——自然性与势态——既是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也是后世楷书审美范式的源头。

此外,吴简研究提示书法史需重视民间书写的历史价值,并进一步探索书写者身份、区域分布及南北交流等未竟之问。长沙走马楼吴简不仅是三国历史的“时间胶囊”,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活化石”,为理解汉字书体的生命力提供了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 [1]李均明,宋少华,等.关于长沙出土三国东吴简牍的数量和内容[J].中国文物报.
- [2]卞玉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书迹研究[D].
- [3]卞玉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书迹研究[D].
- [4]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 [5]庾肩吾.书品[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 [6]宋少华.大音希声——浅谈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初步认识[J].中国书法.